

上博特展演绎『寻秦记』

五百余件文物讲述『肇兴中国』

本报记者 曹玲娟



出土于陕西宝鸡周原遗址的西周卜甲，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明确出现“秦人”二字的文字实物，为探究早期秦史提供了关键的文字实证。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商鞅方升，首次“站立式”陈列，侧壁和底面两组铭文一目了然，历史课本里所说的“统一度量衡”瞬间有了画面……

今年6月至9月，来自甘肃、陕西及上海14家考古文博机构的328套510件文物亮相上博东馆“肇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全景还原秦人从甘肃东部的边陲部族到一统华夏的壮阔征程，揭示出秦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这次我们呈现的，不仅是一个古代王朝的兴衰史，更是一个关于奋斗、融合与开创的故事。”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说。

追溯秦人之源

公元前221年，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王朝，开创制度、整合文化、完善治理，奠定了中华文明大一统基本格局。

提起秦朝，很多人首先想到秦始皇、兵马俑。而“肇兴中国”展最具价值之处，在于把时间线往前推了很久，展现了跨越800多年的历史画卷：秦人从哪里来？如何从甘肃一步步走向关中、定都咸阳，最终完成统一大业？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制度演进与文化融合，进而深刻影响了此后两千余年中国政治文明走向？

近年来，甘肃、陕西秦文化考古硕果频出。本次展览依托甘肃清水李崖遗址、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张家川马家塬墓地和陕西宝鸡秦公一号大墓、西安秦始皇帝陵遗址等重大考古成果，以丰富的文物呈现秦人从部族崛起、立国图强到融汇文化、统一制度的历程。

关于秦人的族群起源，学术界曾有两种观点：一说来自东夷，一说来自西戎。展览第一部分“秦·人”篇，展示了清水李崖遗址出土的陶器，回答了“秦人来自哪里”的问题。

清水李崖遗址秦文化墓葬年代为西周早期至中期，是迄今所见最早的秦文化遗存。“大部分墓底有腰坑，坑中殉狗，这种葬俗具有浓郁的商文化色彩。随葬品中的陶器组合，以鬲、簋、罐、盆为主，方唇分档陶鬲、倒三角纹陶簋等也表现出商文化风格。”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馆员李文平说，这些因素共同反映了早期秦文化与商文化的深厚渊源，从考古学上证实了秦人来自东方，于西周时期西迁至甘肃东部。

第二部分“秦·国”篇，呈现秦人立国及其东进图强的发展历程。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受封为诸侯，建立秦国。秦国建国之初，都城“西犬丘”位于今甘肃省礼县境内。

礼县大堡子山秦先公陵园遗址出土了多件带有“秦公”铭文的青铜鼎和青铜簋，还有成套的青铜钫、青铜钟及石磬。这些器物不仅彰显了秦人对中原礼乐文明的传承，也再现了秦国祭祀礼仪的恢弘气象。该遗址出土的鸛鸟形金饰片等金器，融合中原纹样与草原工艺，体现出秦国早期多元审美与工艺水准。

秦国立国后不久，便往东发展，都城也随之东迁。从西垂之地到雍城、咸阳，秦都东迁的脉络，

正是秦人锐意进取的见证。

陕西宝鸡太公庙窖藏出土的秦公钫，造型雄伟，工艺精湛，饰有飞龙、凤鸟等纹饰，飘逸生动。器身铸有135字铭文，大意为：我先祖襄公受天命被授以宅、被授以国，得到了土地和臣民。功业昭著的文公、静公、宪公不敢怠慢，勤奋做事，没有辜负上天和先祖的期望，光明显赫，并小心谨慎地处理与周围部族、方国的关系。

经学者考证，铭文中的“我”就是春秋时期的秦武公。武公在位时，开疆拓土，设立县治，确立了秦国发展的基本格局和正确方向，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并推行郡县制奠定了基础。

据《史记》记载，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迁都雍城（今陕西宝鸡凤翔区）。雍城是秦国作为都城时间最长的地方，长达近300年。雍城宫殿与手工业作坊遗存，反映了秦国早期都城规划理念。雍城遗址出土的曲尺形青铜构件，形制复杂、做工精良，专家认为是宫殿梁柱上的装饰与结构部件，体现了当时宫殿建筑的宏伟。

见证融合统一

秦国的崛起和兴盛，与其开放包容的文化品格有着莫大关系。展览第三部分“秦·融”篇，聚焦秦文化与西戎文化的交融互鉴。甘肃清水刘坪墓地出土的虎形金箔饰片、鸟纹金饰片等，尽显草原文化的奔放活力；张家川马家塬墓地出土的鍍金银铁矛、动物纹金带钩、车舆饰、交龙纹铜壶等，见证秦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融融合。

宝鸡益门秦墓出土的3把春秋时期金柄铁剑齐聚展厅，格外引人注目。1号剑最为精美，出土时，剑身外有织物包裹印痕，剑身为铁质，呈秦剑标志性的柳叶形；剑格到剑首为纯金打造，正反两面纹饰相同，均为镂空浮雕状蟠蛇纹，极其精细，剑格蛇身相背组成兽面纹。金柄上镶嵌绿松石和料珠，绿松石多精磨成“乙”字形，金翠交织，历经两千余年依然华丽夺目。

“此剑以人工冶铁铸造剑身，可见秦人当时已掌握较为成熟的冶铁技术。黄金与铁的熔点差异悬殊，无法一体铸造，工匠通过分制卯合工艺，严丝合缝装配好铁剑金柄，显示出秦国金属加工、装饰工艺的先进水平。”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馆员李文媛介绍，对黄金的喜好源自北方草原文化，蟠蛇和兽面纹样承袭中原青铜器，金柄铁剑以复合工艺融汇多元文化元素，是见证秦文化博采众长的珍贵实物。

第四部分“秦·同”篇，讲述了秦统一中国的制度创举。秦始皇帝陵园出土的兵马俑、青铜水禽、排水管道等，体现了秦代工艺水平及都城规划智慧；秦代官印、诏版、铜权等文物，是其制度一统的珍贵物证；半两钱、标准化兵器，见证了中央集权体制的高效运转。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长李岗介绍，此次带来了12件（套）文物参展，其中彩绘俑头是第一次出馆展出。这件俑头出土于秦始皇帝陵园兵马俑一号坑，是存世较少、保有彩绘的秦俑，面容栩栩如生。

礼县四角坪遗址出土的回纹空心砖，体现了近年秦文化考古的新成果。四角坪遗址坐落於人工削

平的山顶平台之上，是一处规模宏大、格局规整的秦代大型建筑群遗址，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遗址中心的夯土高台上为一“回”字形建筑，空心砖为建筑四边台阶的踏步用材。研究者推测，四角坪遗址可能是具备祭祀功能的礼制性建筑群，或与秦始皇西巡所准备的祭祀场所有关。

解答“何以中国”

泱泱中华，历史悠长。巍巍大秦，肇始一统。

统一度量衡，设立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秦所开创的制度框架、治理模式与文明范式，被后世王朝继承发展，深刻塑造了中国两千余年的政治文明与社会形态。

对秦文明的探索，是中华文明研究的重要课题，也为“何以中国”写下了厚重而深刻的答案。

褚晓波表示，从2022年的“宅兹中国：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到今年的“肇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上海博物馆已持续举办5场“何以中国”系列大展，通过对考古成果的系统呈现，回答“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让观众理解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深厚底蕴与磅礴力量。

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主任、策展人王巍介绍，本次展览的文物涵盖陶器、青铜礼器、乐器、金器、铁器、甲骨、玺印、度量衡等，种类丰富、材质多元，能反映秦文化兼容并蓄的特质。每件文物对应一个历史阶段或文化现象，共同组成一幅生动展现秦从崛起到融合、再到统一中国的历史画卷。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改课介绍，该院精选54件（套）秦文化重要文物参展，期望通过这批珍贵遗存，让更多观众读懂秦文明的精神内核，读懂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根脉。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侯红伟表示，此次特展既是甘肃地域考古成果走向全国舞台的重要展示，也是以文物实证中华文明绵延发展、阐释大一统历史根基的生动实践。观众在社交平台写下了观展感受：“我们如今谈及‘中国’，大一统是刻在民族血脉里的底色，这份底色，正是两千多年前，秦人以器物、政令、礼制亲手奠定。”“过去以为秦只是靠武力统一，看完展览才发现，包容、务实、制度创新才是秦一统天下的底子”……

展览期间，上海博物馆配套推出学术讲座、艺术工作坊、主题研学等活动，孩子们可以化身“少年秦王”，在展厅中寻找秦统一天下的六大物质条件；还可以当上“小小秦史官”，以秦国地理为脉络，探寻秦人崛起东进的发展道路。

图①：秦代“浙江都水”铜印（上海博物馆藏）。

上海博物馆供图

图②：秦代始皇帝诏版（镇原县博物馆藏）。

上海博物馆供图

图③：参观者在“肇兴中国”展览上拍摄展品。

新华社记者 陈浩明摄

图④：春秋金柄铁剑（宝鸡市考古研究所藏）。

上海博物馆供图

在南京回望大唐

本报记者 尹晓宇



唐代戴帷帽骑马女俑。

六朝博物馆供图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唐代的南京，作为连接南北的重要节点和商贸繁华的城市，有怎样的风貌？南京六朝博物馆的“郁郁乎唐——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给出了一个切面。特展汇聚来自全国20余家文博机构的250余件（套）文物，并首次大规模展出南京出土的唐代文物。

走进第一章“都城营建”，地面展示的唐长安城平面图让人直观了解这座恢宏都市的格局。六朝建康城“以宫城为核心、中轴线主导、主要建筑左右对称”的都城设计思路，和汉魏洛阳城、东魏北齐邺城等同时期都城一起为隋唐长安城的规划打下了基础。唐长安城形成了规整严密的网格状里坊布局，这一风格也深刻影响了后世的都城建设。

长安城的“六街”，即城内通向各城门的六条城市主干道。与建康城考古发现的砖铺道路不同，六街皆无硬质铺装。来自洛阳博物馆的戴帷帽骑马女俑英姿飒爽，帽子也颇为时尚。当时的女性戴帷帽不仅为了好看，还有防尘的作用，正如诗句“六街尘满衣，鼓绝方还家”所描述的一样，在城内骑马容易尘土飞扬。

帷帽来自西域，是一种带有垂纱的笠帽，面纱大概到颈部位置。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则天之后，帷帽大行”。唐初流行的是幕篱，垂纱更长，戴上之后可以遮蔽全身。而“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随着胡汉文化的进一步交融，可以显示妆容的胡帽流行起来，再往后，甚至露出发髻，着男装的风尚也流行起来。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是存世稀罕的唐代建筑，此次展览中展出了佛光寺的建筑构件。佛光寺东大殿屋顶正脊两端有硕大的鸂吻，南京花露岗的南唐灰陶鸂吻造型与之相仿。花露岗正是李白诗作《登金陵凤凰台》中的凤凰台旧址所在。南唐在地方行政、科举、两税制等方面，沿用了唐朝的部分制度并做了适当调整，这件鸂吻反映了南唐建筑形制对唐代的继承。

2016年考古发掘的南京后头山唐墓是迄今为止南京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出土随葬品最丰富的唐代家族墓葬。其墓葬形制与随葬器物均体现出两京地区（长安、洛阳）的特征，同时又有砖砌排水道、直棂假窗、模印砖等南方墓葬的传统元素。墓中随葬的釉陶俑种类较多，有镇墓兽、镇墓武士俑、骑马女俑、胡人俑等，包括骆驼、牛车等模型明器，均以白色陶土为胎，制作工艺与唐三彩类似，先以高温素烧，再施釉低温烧制。

六朝博物馆综合业务部副主任、策展人尹知博介绍，南京后头山唐墓出土的釉陶俑群与洛阳地区同类器物的制作工艺接近，推测其烧制地可能在洛阳，然后通过大运河转运到了南京。

唐代最流行的钱币为开元通宝。它是唐高祖李渊在武德四年（621年）开始铸造的货币，《旧唐书·食货志》称，该钱“径八分，重二铢四舍，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开元通宝钱在中国货币史上意义重大，该钱制将货币单位由标示金属重量改为纯粹的货币符号，开创了中国货币史上以通宝、元宝等作为铸币标示的货币系统。开元通宝十枚重一两，改变了秦汉以来以二十四铢为一两的传统，使十钱为一两的衡量单位逐步形成。

展览中有一枚出土于南京市江宁区南唐二陵3号墓的开元通宝银钱，为武德年间铸造，但它不是流通的货币，而是宫廷赏赐之物，和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的同类银钱形制很相似。开元通宝不仅在南京的唐代墓葬中有出土，在宋元乃至明清的墓葬中也有出土，展厅中将历代墓葬出土的开元通宝摆成一条河流的形状进行展示。尹知博解释，开元通宝在五代乃至宋元仍有流通，以南京为都的南唐也曾铸造过开元通宝，这体现了唐代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六朝的历史演进为隋唐帝国的兴盛奠定了基础，一些六朝士族的后人在唐代仍受重视，展览中的明征君碑拓片体现的正是这一内容。明征君碑立于唐高宗时期，由唐高宗李治撰文、书法家高正臣书写，系平原明氏后人明崇俨为其先祖明僧绍所求，碑阴“栖霞”二字据传为高宗御笔。

碑文记载了南朝隐士明僧绍隐居栖霞山及栖霞寺早期发展的历史。栖霞寺始建于南朝，至唐代已成为江南地区佛教中心。明征君碑是现存唐碑中的珍品，不仅具有重要的书法价值，也反映出六朝和唐代之间的紧密联系。

历史的烟云已经远去，长江依然奔流不息。千年后，透过一件件精美文物，仍能深刻感受到博大包容的大唐气象。



南唐灰陶鸂吻。

六朝博物馆供图